

范丽敏 著

ZHONGGUO GUDAI
BAIHUA XIAOSHUO ZHITAN

中国古代 白话小说撷谈



齊魯書社

◎ 俗文化語彙 · 一

中國古代
白話小說匯談

中國古代 白話小說匯談

卷十 第四

范丽敏 著

中国古代 白话小说撷谈

ZHONGGUO GUDAI
BAIHUA XIAOSHUO ZHITAN

齐鲁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摭谈 / 范丽敏著. — 济南: 齐鲁书社, 2014.12

ISBN 978-7-5333-3311-9

I. ①中… II. ①范… III. ①古典小说—小说研究—中国 IV. ①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308108号

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摭谈

范丽敏 著

主管单位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ilupress@126.com

营销中心 (0531)82098521 82098519

印 刷 济南天马旅游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9

插 页 3

字 数 186 千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3311-9

定 价 39.00 元

序

与范丽敏教授相识已有十几个年头了，她最初在济南求学，后来又在济南大学工作，交往也就渐渐多了起来。另外还有一层因缘，她上世纪末攻读硕士学位时的导师、山东师范大学的许金榜教授，本世纪初她进入首都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导师张燕瑾教授，以及先后在浙江大学、东南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时的合作导师徐朔方教授、徐子方教授都是我非常敬重的前辈或师友，都有过或多或少的交往，且都在他们身上获益良多。因此，当范丽敏教授请我为她这部新作写几句话聊以为序时，也就不好推辞了。

范丽敏教授的这部新作名为《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摭谈》，初读之后，我感觉有这样几个方面颇具新意。首先，从文化思想层面论述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基本特征，如“论中国古代戏曲与小说的三种文化精神”一节，指出了作为通俗文学的戏曲与小说具有市民文化精神、正统文化精神及少数精英文人的文化精神，并分别以《三国演义》



《水浒传》《歧路灯》《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三言”、“二拍”等长短篇白话小说及《琵琶记》《贞文记》《娇红记》《桃花扇》等戏曲作品为例作了具体分析。

范丽敏教授认为,市民文化精神“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表现为正面的讲究诚信、义气、公正、睿智;一方面表现为负面的极端的利己主义与市侩主义”。《警世通言》卷五“吕大郎还金完骨肉”、卷十八“老门生三世报恩”、卷二十一“赵太祖千里送京娘”,《醒世恒言》卷一“两县令竞义婚孤女”、卷二“三孝廉让产立高名”、卷十七“张孝基陈留认舅”、卷十八“施润泽滩阙遇友”等,都属前一类;洪梗“六十家小说”之《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等则属于后一类。中国古代戏曲与小说大都以儒家伦理道德为宗旨,《三国演义》中刘备、诸葛亮、关羽,分别为“仁君”、“忠臣”和“义士”;《水浒传》中梁山好汉的首领宋江,忠心不二,至死仍坚守“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的信条。元代南戏《琵琶记》中的赵五娘,明代传奇《贞文记》《娇红记》中的张玉娘、王娇娘,清代传奇《桃花扇》中的李香君,或贤孝,或节义,或贞烈,要之,均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旨归。

范丽敏教授还特别指出,在少数精英文人的创作中表现出一种超越于传统伦理道德之上的、具有人文主义色彩的文化精神。曹雪芹的《红楼梦》除揭示了那个时代的女性悲剧、爱情婚姻悲剧和家族悲剧外,还思索了另外

两种悲剧。一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的生命有限性悲剧,即人的生命是短暂而且无常的。二是把人类放在广阔的空间和浩渺的时间里思索了人的价值和归宿,否定了传统的、世俗的光宗耀祖、建功立业的价值观念,试图指出一条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和更符合人性的人生道路,即“爱人”,即用真情去温暖和充塞短暂无常的人生,从而使人在有情和充实之中。孔尚任的《桃花扇》打破了传统的才子佳人小说戏曲模式,让李香君与侯方域在国破家亡的背景下毅然放弃儿女私情,出家入道而去。作品充满了对朝代更替的浩叹,作者意欲冲破这朝代更替的怪圈,预感到封建社会这个“天”行将崩溃,不再有幻想,故而不再让他的男女主人公当场团圆,然而却又找不到出路、看不到希望,于是只好安排他们双双出家入道而去。孔尚任借老赞礼对人生、对世事的反复咏叹,启发了读者思索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及国家民族的何去何从。这些分析都极有见地,抓住了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文化精神的本质。

其次,能够在理论上有所借鉴创新。“社会学视角下的《水浒传》文化批判”、“结构主义视角下的《金瓶梅》文化探析”、“‘大旨谈情’——论《红楼梦》之‘情本体’”等三节,从理论高度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文化精神进行了个案分析。《水浒传》与《金瓶梅》一度被视为“诲盗”、“诲淫”的代表作而饱受争议,范丽敏教授分别运用社会学和



结构主义理论对两书作了探析。《水浒传》中的(私)“义”之大于(公)法、(集团)内(集团)外之别,“食人”的爱好和嗜杀,仇视女性等现象究竟应当如何看待?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指出,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农业型的社会,这种社会的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因此它使人遇事总是从私人感情出发采取不同的态度;“差序格局”的界限性使人视集团外部的人为异类,因此是可食可杀的;古代农业“匮乏经济”使夫妻偏于事业上的组合,而父系制又使家庭的主轴在父子而非夫妻,因此社会对夫妻感情和女性采取禁锢和歧视的态度,也使男性的感情重心向着同性倾斜,而致“同性原则较异性原则为重要”。从这一角度考察《水浒传》,其中很多所谓“反人性”的内容也就可以理解了。

结构主义倡导从共时性的角度探讨故事讲述的模式及模式之下内蕴的深层结构,从而达到对某种共同的文化精神或心理即“价值”的认识。以此关照《金瓶梅》会发现:一、《金瓶梅》和宋元时代及其后的同类小说存在着共同的“语法”,即“耽淫(或好色)亡身(身危)”模式,尽管其“讲法”各有不同,但其基本的“语法”是不变的;二、《金瓶梅》中的人物存在着二元对立关系,其深层结构是商品经济条件下扭曲的男女情爱关系——男人通过金钱占有女人,女人通过男人占有金钱;三,对生命价值与意义的终极追问,表达的是在宋元以来商品经济高度发展

和明中后期“心学”思潮流行的背景下人物放纵本能后精神上的无所皈依感。这一分析较好地解决了《金瓶梅》淫秽描写的根源问题。

范丽敏教授对《红楼梦》“大旨谈情”之“情”做了哲学探寻,指出中国古代的农业经济造成了中国古人重“情”的文化心理,这种文化心理以“情”为人生的最终实在、根本,可称之为“情本体”。分析了曹雪芹从这一文化心理出发所描写的贾宝玉在欲而无情、理而无情的社会现实背景下“以情体道”和“以情悟道”的人文历程。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视角分析指出,宝玉“情生”理想失败的原因不是由于天道循环即“好就是了”所造成的,而是在经济基础未改变的情况下,仅作精神变革的必然结果。运用社会学、结构主义及哲学理论对以上经典作品进行分析,显然更有说服力。

再次,研究目的十分明确,正如本书绪言所说:“在研究中不能忽视对经典之外的作品的研究,然经典如同宝藏,其思想内涵的丰富、艺术魅力的精妙,使其永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深度解读的可能。本书主要对宋元明短篇白话小说经典(主要是《清平山堂话本》和“三言”、“二拍”所收的部分篇目)和长篇白话小说经典《水浒传》《金瓶梅》进行研究,兼及中国古代长篇章回小说的巅峰之作《红楼梦》,“论《杨家将演义》中‘静山大王’的原型及其衍化”、“武松的形象、来源及社会学解读”、“论《金



瓶梅》的‘隐性’累积——兼评‘个人独创说’”等三节就是在这方面的有益尝试。

范丽敏教授指出,“静山大王”是宋元明讲唱文学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人物,如小说话本《简帖和尚》《错斩崔宁》,“明成化说唱词话”《张文贵传》和长篇评话《杨家将演义》。根据此四种作品对同一个人物“静山大王”的描写,可以判断此形象最初应出现在《杨家将演义》中。在正史中可以找到“静山大王”的“原型”,即占据横山一带的“静难军节度使”。其在其他几种文学作品中的重复出现表明宋元明讲唱文学是以“因袭”为特征的。“静山大王”和其原型的同与不同,反映了通俗文学创作的一条规律,即衍化和变异。

武松是《水浒传》最重要的人物形象之一,也是中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一位英雄,其英雄的性格和行为深深地刻在了中国人的脑海里,一定程度上成了“英雄”的代名词,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和国人的民族性格。然而却很少有人注意到他还有非英雄的一面,即痞子的一面,而且这一面还应是他最原始、最本真的形象内核。其痞子加英雄的形象包括姓氏、名字、相貌、行迹、性格等当来源于与其同时的“小说”、“讲史”话本。形成其痞子加英雄形象的原因在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游民队伍的壮大,及生存文化条件下人们对肉体力的崇拜、对女性的歧视防范和市民阶层的文化自卑心态,及古代“差序

格局”(费孝通语)型的伦理社会的交互作用。可以说,“武松”就是中国古代农业文明所孕育出来的“英雄”的代表,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

学术界一般认为《金瓶梅》是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范丽敏教授则与徐朔方先生观点一致,认为《金瓶梅》是一部“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只不过由于题材的原因——取材于世情,而非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那样所写人、事皆于史有据,因而累积之迹隐蔽——故称之为“隐性”累积。范丽敏教授特别指出,这里所说的“集体创作”是指对基本相同的人物、事件的照搬、因袭,而非指艺术构思及其结构;坚持集体创作的观点,不等于否认加工、写定者的存在及其功绩。为了证明这一观点,范丽敏教授对《金瓶梅》中的潘金莲、李瓶儿和庞春梅三位女性形象作了考辨,发现在宋元小说话本中都可以找到她们的原型。除主要人物和情节对宋元小说话本照搬、因袭外,一些常见的、作为惯常格式的每回回前、回末、回中的韵语(多为市井或勾栏流行的谚语、歇后语),惯用的对人物相貌、庄院、楼馆、季节(春夏秋冬)、节气(清明、中秋等)、时辰(黎明、傍晚)、天气(雨雪雷电)、人物特定的感情状态(相思、患病等)等的赞词,人物以曲诉情,故事中的曲艺表演等多系引录、借用、抄改自前人作品,甚少独创。

笔者非常同意范丽敏教授的这一意见,由此也可见



出,任何事物的发展总要有有一个过程。古代长篇章回小说从累积成书到独立创作,并非一蹴而就,其中有若干环节,《金瓶梅》正是这若干环节的重要一环。正是《金瓶梅》的出现,为后来的小说家提供了艺术经验,才使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终于走上了独立创作之路。

范丽敏教授已经出版过专著《清代北京戏曲演出研究》,在《社会科学战线》《学术月刊》《明清小说研究》《艺术百家》等刊物上发表了二十余篇论文,现在又完成了本书的撰写。这对于一位刚届不惑之年的女性学者来说,的确让人刮目相看。我想,范丽敏教授之所以能够在学业上进步迅速,除了她本人的刻苦与颖悟之外,诸位名师的指导至关重要。作为年长二十余岁的同行,我为她感到高兴,并希望她不断有新的论著面世,为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做出更多的实绩。

王 平

2014年12月6日于山东大学

目 录

序	1
绪 言	1
第一章 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思想内蕴蠡测	9
第一节 论中国古代戏曲与小说的三种文化精神	10
第二节 论中国古代早期白话小说对女性的三种态度 ——仇、畏、猥	22
第三节 社会学视角下的《水浒传》文化批判	37
第四节 结构主义视角下的《金瓶梅》文化探析	54
第五节 “大旨谈情” ——论《红楼梦》之“情本体”	64
第二章 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创作方式谈	91
第一节 论《杨家将演义》中“静山大王”的原型及其衍化	92
第二节 论《金瓶梅》的“隐性”累积 ——兼评“个人独创说”	108
第三节 潘金莲、西门庆姓名来源刍议	135



第三章 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人物形象谈	151
第一节 武松的形象、来源及社会学解读	152
第二节 论潘金莲	174
第三节 论秦可卿的结构意义和形象意义	198
第四章 《金瓶梅》演戏组织考	225
第一节 “本司三院”考	226
第二节 家乐和南方戏班	246
主要参考文献	264
后 记	276

绪 言

一、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之概念及本书的研究对象

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即在中国古代以白话散文为主写成的、以敷衍故事为中心的叙事文学作品。其涵盖范围主要包括宋元以来的白话短篇小说和长篇章回小说,如现在所能见到的《清平山堂话本》、“三言”、“二拍”、《鼓掌绝尘》《型世言》《醉醒石》及《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等。对于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之数量,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作家出版社 1958 年版)凡例云“凡已佚未见及见存诸书,都凡八百余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文化研究所编《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0 年版)列目及介绍通俗小说约 1164 部,石昌渝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4)凡例称“本书共收小说 1251 种”。对如此众多的作品,本书选择从有代表性的文本或曰经典文本入手,进行自己的“话语”阐释。



从总体上说,在研究中不能忽视对经典之外的作品的研究,然经典如同宝藏,其思想内涵的丰富、艺术魅力的精妙,使其永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深度解读的可能。本书主要对宋元明短篇白话小说经典(主要是《清平山堂话本》和“三言”、“二拍”所收的部分篇目)和长篇白话小说经典《水浒传》《金瓶梅》进行研究,兼及中国古代长篇章回小说的巅峰之作《红楼梦》。

二、本书的研究内容

1904年,王国维先生用西方哲学和美学观点评论中国小说,发表了《红楼梦评论》,是中国小说研究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标志。此后,小说研究向着多元方向发展,如以研究对象而论,有文献整理与研究、文体研究、接受与传播研究、作品本身之研究等。以上几种研究皆取得了丰赡的成果,然对作品本身的研究正日益为人所重视,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刘再复先生在其《红楼梦悟》一书之《论〈红楼梦〉的哲学内涵》章开篇说,一辈子都在“考证”《红楼梦》的俞平伯先生曾多次在公开场合主张应多从哲学、文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①这是因为:一是在

^① 一次是在1986年1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纪念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会议,俞平伯先生讲话的“中心意思”即明确提倡从哲学、文学角度研究《红楼梦》。同年11月,俞平伯先生应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和香港三联书店的邀请所作演讲亦提到此意。见箫悄:《古槐树下的学者——俞平伯传》,杭州出版社2005年版,第342页。

进行了充分的外部研究的情况下,回归到对小说本身的研究符合当前的研究趋势。二是作品研究(除了对作品存佚归属、版本等问题的考证外)尤其是思想内涵和人物形象的研究,研究者个人的主观分析和判断占的成分大些,故容易受到时代社会思潮的影响。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受西方哲学思想、文学理论的影响,多以进化论的观点为基础进行小说史研究;四五十年代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日益深入,社会—历史批评方法逐步盛行;尤其五六十年代,在文学批评领域,阶级斗争论和庸俗社会学观点流行,给科学、公正地分析和评价作品与人物带来了极大的干扰和破坏。在新的时期,对于文本的思想内容和人物形象有进一步深入阐释的必要。三是叙事文学作品多以人物塑造为中心,一部经典的小说作品,最为读者所瞩目和念念不忘的往往是它的人物及其所体现出的思想倾向。因此,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在新的研究视野和方法下,客观、公正地对作品进行“阐释”是题中应有之义,是以本书选择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思想内涵和人物形象进行研究,兼及编创方式及戏曲史料的考辨。

三、本书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首先是社会学的研究视角与方法。本书利用社会学的视角和观点对部分作品进行了解读。什么是社会学?